

从宋征舆“志喜”说起

沈敖大

明末,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事儿,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当时,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,很少见到对吴三桂之举贬褒的言论,顾不及此么。但也有闻吴三桂引狼入室消息第一时间“志喜”的人,此人便是号称“云间三子”之一的宋征舆。

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<幽兰草>>倡和诗余>》中的云间三子传,宋征舆,字敏文,华亭人,顺治四年进士,历官福建布政使左参议,尚宝卿,左副都御使。说明这宋征舆是清朝的“部级”大员。

据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》序说,陈子龙是被俘不屈死的,时年四十岁,时间是顺治四年;李雯死于同年,时年三十八岁,被逼迁清后羞死的;而就在陈子龙、李雯去世的同年,宋征舆兴冲冲地参加了大清的进士试,并荣登“黄榜”。三位同为“三子”不同命。更有意思的是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》的内封上的署名:[明]陈子龙,[清]李雯,宋征舆,把云间三子的壁壘居然分得很清。

在这且看宋征舆的诗。诗题《闻吴大将军率关宁兵以东西二虜大战李贼志喜二律》,今举其一:“将军追忆弃关迟,擐甲号天起义期。缟素一军皆死战,鲸鲵百万已成尸。英灵长啸燕山月,壮士悲歌易水时。总道中原愁左衽,却今江表定京师。”(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》卷八)。诗中“关宁兵”是西起山海关东至辽宁宁远(今兴城)一带防线上的军队,是仿游牧民族组建的骑兵,号“关宁铁骑”。它由袁崇焕创建,吴三桂乃末代统

帅。“东西二虜”,即山海关以东的后金族,山海关以西的伪装蒙古国兵的后金兵。吴三桂所谓“借兵”,就是请后金多尔袞率“东西”二部进入山海关,合兵攻击李自成部。

史载,吴三桂回军山海关,李自成率军(号称百万)攻击之,与关宁铁骑在一片石处激战,战酣,清兵突入,致李自成军一溃千里。“鲸鲵百万已成尸”,指意在此。

以我搜集到的有限材料,赞赏吴三桂引狼入室的,宋征舆是第一时间第一人,以我的能力,还未找到第二个。

读宋征舆的诗可见,他是把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的。只要灭了“闯贼”,就该“志喜”,至于清人坐了龙椅,只是个“愁”(中原愁左衽)字,而且未必是宋征舆愁,这从“总道”两字可以看出,何况朱家有人在江南“定京师”了呢。

此种观点,就不由我想起清末的刚毅,他的名言是“宁赠友邦,不予家奴”(清末刚毅语)。这且不说。

同样是大清朝的臣民,七年后,太仓的吴伟业也撰了一诗,歌行体的《圆圆曲》。此诗的名气比宋的“志喜”诗大多了,流传甚广,在此就不录全诗了。但从《圆圆曲》的表述来看,作者对吴三桂先降李(自成),后又引清兵入关的做法不是“志喜”,而是讽刺,“恸哭六军皆缟素,冲天一怒为红颜”“妻子岂应关大计,英雄无奈是多情”,拆穿了吴三桂致多尔袞信中所说为君父报仇的谎言。

有意思的是,两百多年后,光绪年间的生员王竹修(字养拙,号虚庵,清台中人),也以吴三桂向清借兵事撰诗一首,题

为《吴三桂借兵》:“此行勉效秦庭哭,岌岌孤城待援兵。策马出关终辱命,引狼入室大伤情。原期闯贼罹天网,岂料清军夺帝京。国破君王谁可诉,恨无一剑送残生。”

王竹修的诗不见“志喜”意,也不全是浓浓的“讽刺”,只是说吴三桂借兵勉强可以说像中包胥的向秦借兵的忠,实际上呢,既“辱命”(违背了借兵的原意)又伤情(造就了引狼入室的局面),“闯贼”纵然“罹天网”,但大清已入主中华(清军夺帝京)。总之,吴三桂最好的归宿是一死了残生。这就有点恼怒了。

前后三首诗相比,不论立场,从水平观,我以为宋诗较差,差在其诗四平八稳,既不见作者情绪的明显起伏,也无诗意的大波动,就像一部电影的片名《不动声色》一样。文似观山不喜平,诗也应这样。

原因我看很简单,就是他对战争的残酷并无切身的经历,没有切肤之痛。同样是“志喜”,杜甫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就灵动得多,为什么呢,因为杜甫几乎和百姓一样,亲历了血和泪的剧痛,他到过战乱中的长安,看到过春天长安的深深草木,陷入过见花溅泪,闻鸟惊心的心路历程,甚至惨到“麻鞋见天子,衣袖露两肘”的地步。所以他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就灵动得多,感情的起伏也大,初闻是“涕泪满衣裳”,随即“喜欲狂”,体现肢体语言上是“漫卷诗书”“放歌纵酒”,然后想象回家时的背景“青春做伴”和回乡的速度“即从巴峡穿巫峡,便下襄阳向洛阳”(时杜甫家在洛阳),“从”“穿”“下”“向”,风驰电掣,“秒回”洛阳。

顺便一说“云间三子”虽负盛名,且诗的数量不少,仅新诗合稿就有九卷八百首。但传世之作鲜见,原因也许与“三子”的创作取向有关。依我浅见,他们崇尚的也许是汉晋(而非唐宋)的传统,不够通俗上口的缘故。

松江府中学堂

林琳

参考书146部、地图23种、博物器械标本模型233种,及一些理化教学器械。值得一提的是,松江人张蕴和(后为《申报》副总主笔)为求新学,1902年赴日本考察,回国后将所得资料悉数提供给松江府中学堂创办之用。

1904年,松江一府七县(除上海外)唯一的一所新式中学——松江府中学堂正式成立,当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招考新生。它是松江府的最高学府,也是唯一的公立中学堂,经费来源于原云间、景贤两书院置粮、漕、典当捐等,及各项善举余款、求忠校士馆盈余等项。开办时知府田庚任总办,谢葆钧任监督(校长),由谢监督负责,共聘任教职员16人,其中张锡恭以经学负盛名,陈灿勋为英文教员,张国维为地理教员,招收学生一百零几人。

谢监督豪迈有才干,创办新学,推行教育革新,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以中国经史为基础外开设英语、数理化等学科,亦有体育(体操与武术)、歌咏与演剧等,学制四年,不分初、高中,190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学。松江府中学堂教员虽少,但均为一时翘楚,不乏留学生和同盟会会员。日本留学生、后为《时报》主笔的秦毓钧1907-1908年执教于此。他们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民主思想,因材施教,新学桃李芬芳,又因谢

监督躬行教务,督教督学,治校有方,且训育多策,故学生中俊才辈出,一时间松江府中学堂成为江浙沪等地声誉卓著的学府之一。1908年(农历1907年12月)其首届毕业生被社会上称作秀才,姚鹓雏与杨孝述就是其中的文理双璧,垂名青史。姚鹓雏是南社“四才子”之一,一代词章大家和小说家,解放后任松江县副县长,而杨孝述是第三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,中国现代科学普及的奠基人和教育家之一,也是沪上鲜有的学者型的实业家。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做了小学教员,甚至校长,鼎助初等新式教育。

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,不久上海光复,松江旋即成立军政分府,谢葆钧任民政部长,兼任教育。同盟会会员、回国后1911年任教松江府中学堂的李维翰(字芭香)佐钮承建光复松江,任军政分府的编核科长,与朱叔建、蒋轼等成立松江政论会,创办《政论报》,任主编。故松江府中学堂发起组织驻松学生军,参加松江政论会,采集舆论、发表政见与督促政治进行。崇尚事实的谢葆钧离任后,校长一职由数理教员倪索伊担任。倪校长重视学校管理和学生学业,善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,提倡实验。之后校长一职由夏日琦、孙观澜先后担任。孙校长还将校内西侧荒芜之地建成室内操场。

1913年7月,松江府中学堂根据江苏省教育部指令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,部分教员留任。其成立之初就有较完善的学科设置、校舍教具等,应得益于府中学堂。

箱布情怀

何文权

她把衣服卖给他们。她拒绝。对方先从出价三元递增到四元、五元,徐雪宝实在抵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,最终对方如愿以偿欢天喜地而去。这踏布的精致可见一斑。

叶榭文体中心恢复箱布四脚踏织造工艺期间,曾在当地请来多位织作能手,由于老人们已经四五十年没有摸过织机,记忆已经模糊,都以失败告终。后来有热心村民介绍叶榭周边地区几位织作能手,也未能达到目的,因而曾几度想放弃。几经周折,后来在王金英老人的帮助下,文体中心找到了当时已经九十高龄的井凌桥村金秀琴老人。老人一口答应,由其女儿带着药品陪她前来,直到试织成功。几天里,老人躬身劳作,有时执意坐地指导,恢复难度超出了原来的想象。

箱布品种里还有一种三脚踏织造工艺,也称小提花工艺,很有特色,织物质地细洁,花纹细巧,表面纹路凸起,既可以做衣服面料,也可以制作毛巾,过去新娘子出嫁时作宾客礼品。遗憾的是,当文体中心想再次请老人“出山”,攻破三脚踏织造工艺关卡时,新冠疫情暴发,不久,老人走了。于是又四处寻访三脚踏织造工艺的能人。

松江九峰和“九峰十景”

邢砚斐



松江的山,以九峰为著。而唐、宋之前,松江并无“九峰”一词。此说,始见于陆鹏南(字象翁,宋末元初华亭人)所撰《九峰清气集》。陶宗仪曾云:“长谷以东,通波以西,九山离立,如幽人冠带拱揖状。此九峰所以称也。”

将九峰评定次第,则出自元代诗人凌岩。凌岩,字山英,号石泉。宋代靖康年间,其先辈从河南开封南迁,徙居华亭,遂为邑人。凌岩的《古木风瓢集》有“华亭杂咏”九首,将郡中九峰列序为:一,凤凰山,二,陆宝山,三,余山,四,细林山(即辰山)、五,薛山(又称玉屏山),六,机山,七,横云山(横山),八,干山(即天马山),九,昆山(即小昆山),凌岩将九峰逐一题诗,留下佳咏,被时人称作“山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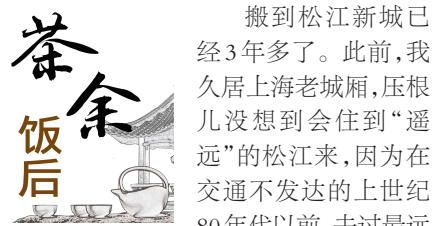
《正德松江府志》记曰:“陆宝山。本陆氏家山,界凤凰、玉屏之间,山多土少石,而土又美,人争取之,今夷为平陆。”又曰:“厓公山。在凤凰山南,与陆宝山隔溪对景。昔有厓公隐此,因名。”另据《光绪松江府续志》考证:“陆宝山。山在长生泾(今称长湘泾)。今尚存山石十余。”玉屏山(薛山)在凤凰山西、厓公山在凤凰山东南。按此推测陆宝山的位置,大约是在今月湖北侧。因陆宝山已夷为平陆,即便尚存山石十余,也难以称峰,后人遂以厓公山替补为第二峰。

松江九峰山上,均有不少名胜。而每峰“十景”的出现,时在清初。《嘉庆松江府志》将“九峰十景”详细予以记录,其后的府、县志及相关资料均以此为是,且沿用至今。《嘉庆松江府志》载明:“九峰十景”出自《九峰志》。

《九峰志》乃诸嗣郭所撰。诸嗣郭(1623-1682),字越臣,另字乾一,又字琴莊。号勿庵,别号松樾。幼时为徐方广弟子,陈继儒、董其昌见之,目为神驹。顺治十八年(1661)成进士,尚未殿试,即受江南奏销案牵连,遂绝意仕途,放情山水,自号九峰主人。诸嗣郭曾于康熙间主纂《青浦县志》。《光绪青浦县志》中有传。

其说诸嗣郭所撰的《九峰志》并未刊印。因撰《九峰志》,书未竣,人已逝,仅留铁板二十七块。嘉庆十六年(1811),后人诸联在《明斋小识》卷一“九峰志”中提道:其父曾见过未全之书,并摘录给他。今山中名胜多半磨灭,恐久而失传,于是将“九峰十景”整理记录下来。

《明斋小识》成稿于嘉庆十六年(1811)、《嘉庆松江府志》则刊刻于嘉庆二十三年(1818)。因此,府志“九峰十景”的记载,并非出自诸嗣郭《九峰志》,而是从诸联的《明斋小识》中转抄而来。



这一寻访就是大半年。终于在大庙村找到沈爱娥和金红芳两位理想中人。一周里,两位老人废寝忘食地工作,迎来的却是连连失败,她们为此充满了自责,其中一人竟夜不能寐,不久生病住院……一个细雨纷纷的上午,全身湿哒哒的她们来到文体中心,高兴得像个孩子,想起来了!说完匆匆走进基地投入工作……

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她们对箱布的那种热爱和情怀,是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。陈列室里,于友人的女儿而言都是新鲜的,好奇的。她说,她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幅传世名画《姑苏繁华图》,画中的布行中有一处特地标注出“松江加长扣布”(即叶榭箱布),听说箱布就出自松江浦南地区曾经最热闹的棉纺织中心——刷布弄。哦!原来箱布就是用这种织机织出来的!此刻,女孩对眼前的织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传承人示范、手把手地耐心帮助下,她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感觉,后来可以咔嚓咔嚓地织作了,从她的笑容里,能感受到一梭一线中编织着她心中的美好。我拿出手机,拍摄角度选在织机正前方的位置,对焦画面出现一束笔直的五彩经线,凝视久了,眼前的景物,幻变成了穿越古今的文化之旅……

生活茶座

盛庆庆 书

家住新城

郭时民

天天打卡的地方,开阔的视野,宜人的景色,漫步绿道,微风轻拂、花草摇曳,犹如一处天然氧吧,令人流连忘返。交通也十分方便,出门不到5分钟,就有多路公交站点;要去上海中心城区,地铁9号线可直达。

回想当初在上海老城厢,狭窄的弄堂终年晒不到太阳,住在底楼毫无私密性可言,因弄堂连接两端道路,路人穿弄而过,寒舍内场景映入眼帘,而只有14平方米的居室天热的时候,不开门太闷热,这是因为无处可安装空调外机。这还好,14平方米的房子,去掉2.5平方米厨房,吃喝拉撒全在11.5平方米的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狼狈!“方便”成了极不方便的事情,老城厢里大部分住所没有独立卫生间,全靠木制马桶或痰盂替代抽水马桶,一天至少跑一次倒桶站,有时不止,而后在下水道旁洗刷马桶或痰盂是必备的“功课”,洗完马桶一只只靠在墙边等晾干的马桶,成了一道常规“风景线”。

尴尬的还有老夫妻俩和已经成年的女儿一起蜗居不到11.5平方米的房间,只能搁置一张床,两代三个成年难以挤在一起。无可奈何只能向孩子的爷爷奶奶求助,让她每天住宿到爷爷奶奶家,直到女儿成家为止。

如今,当我坐在明亮宽敞的客厅里会客的时候,当我在书房里指尖在键盘上翩翩起舞的时候,脑海里时不时会浮现出上海老城厢蜗居狭窄弄堂房子的尴尬情景。回望过去,展望未来,我深切感受到,泱泱大国正在孕育着厚积薄发的力量,松江新城之花也在不断绽放。